

[I]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1) 建构主义与“认识的客观性”

与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领域更致力于在方法论上结合目的性价值判断、意识形态与“认识的客观性”，并且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比如文化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1955年首先提出的建构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斯特劳斯对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观进行了相对化，强调在与现代西欧同时代的其他地域空间里，看似尚未开化的社会所拥有的世界观也具备一定程度的完整的构造体系，并在这一点上与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观具有同等资格。⁵在这里，作者对于将看似未开化的社会和发达的工业化社会按照历史发展阶段进行纵向排序，将前者的世界认识视为幼稚、落后的社会，而将后者视为成熟进步的社会，这种持续至今的“常识”进行了彻底反省。斯特劳斯认为处在同时代横轴的辽阔空间里的地球上各种各样的世界观都以同等地位、同等价值的资格存在，这些世界观拥有的“认识的客观性”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优劣之分。

以某个特定文化体系下之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认识世界的客观性”，与以其他文化体系下之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认识世界的客观性”可以说基本上是等价的。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世界观框架确立的对世界的各种认识可以同时并存，因此不可能决定到底哪一种世界观更可以“客观”地认识世界。⁶

(2) “范式史观”与“认识的客观性”

科学史学家度恩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了同样的方法论尝试。1962年，度恩提出了引起很大争论的“范式史观”，他从历史纵轴的时间广度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某个时代的世界观与其他时代的世界观，也即不同时代的复数世界观之间是平等的，具有同等价值，不承认它们之间有认识上的累

积性递进关系。⁷

总之，度恩认为历史上的世界观的转变，并不是在前一个时代世界观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积累而产生的认识进步的产物，仅仅是将以前观察世界所用的特定的有色眼镜摘下来，换上一付别的有色眼镜重新观察世界所导致的认识变化而已。⁸

不管是斯特劳斯还是度恩，他们都首先承认，由于人们只能依据受到其所在社会的地域空间以及历史事件制约的世界观来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或者说不可避免地会带着有色眼镜认识世界，并认为戴上这样的有色眼镜并不能说就导致缺乏“客观性”的错误认识。在这里仅仅就是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通过各种各样的有色眼镜所观测到的不同世界的意象而已。因此，究竟谁更加“客观”、正确，谁缺乏“客观性”、是错误的认识，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判断优劣的唯一标准。

让我们看一个更通俗易懂的例子。比如拿只能分辨出七种颜色的人类与可以分辨出包括紫外线、红外线等十种颜色的动物作比较，显然不可能存在一个决定人类与动物之间谁认识到的世界更带有“客观性”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人类即便抱着特定的目的性意识，或者伴随着这种意识已经拥有了在一定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所描绘的世界观——任何世界观都是在目的性价值判断基础之上建立的——，也不能就此推定人类的认识缺乏“客观性”。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人类的世界观都是在多少要受到地区、历史因素制约的情况下才建立的，因此“客观性”只能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客观性”的世界观。

(3) 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论与现代科学的诞生

但是我们还必须提及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的确，人类的世界观包含跨越时代与地区的目的性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戴上了有色眼镜），尽管如此，在西欧现代科学出现以前，这种目的论并不一定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以各种拜物教（animism）为起源的古希腊泛神论就是这种（非人